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9年9月2日 (第198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在全球化时代，中美经济一损俱损

无论美中经济关系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它都极大地造福了两国社会，其破裂将打击两国经济，对双方国内繁荣造成巨大损害。

# 中美关系

## 美国将会想念中国资金

《外交政策》网站 8 月 19 日载文称，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也使人们忽略了中国对美投资急剧下滑的事实。

自关税战爆发以来，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一直在下降。从 2016 年到 2018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了 88%，且今年没有任何反弹的迹象。据估计，中国学生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 130 亿美元，而在今年 6 月，中国政府警告在美读书的 30 多万名中国学生重新考虑美国的环境是否友好，因为获得签证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每年对美国旅游业贡献 350 亿美元，而去年，中国赴美旅游的人数 15 年来首次下降。

这些数字对美国国内经济造成了直接伤害，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中国在美国的多重投资流以及与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赋予了美国强大的影响力，如今这种影响力正在下降，而且实际上比双边贸易萎缩得更快。

特朗普发一条推特，几乎就能征收或取消关税，但要为外来投资创造受欢迎的环境，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关税战之前，由于中国对美投资逐年飙升，美国在与中国合作修订贸易条款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但现在打着采取强硬立场的旗号，美国已经削弱了自己。

## 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加剧

皮尤研究中心网站 8 月 21 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

美国，多数人认为当前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很差，且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升至 14 年来的最高水平。主要调查结果如下：

如今，60%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达到皮尤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共和党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消极，70%的共和党人及倾共和党的独立人士对中国持负面看法，59%的民主党人及倾民主党的独立人士持同样看法。

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中间持续的贸易摩擦和关税的影响。超过一半的美国人(53%)认为当前美中经济关系不好，41%的人认为两国经济关系良好，仅 2%的人认为非常好。尽管如此，美国人并不一定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不利。相反，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美国有利，而不是有害(50%对 41%)。

不过，当谈及中国的军事实力时，8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对美国不利。此外，调查发现，美国老年人对中国的看法往往比美国年轻人更消极，而且相较于未获得大学学位的人(57%)而言，拥有四年大学学位甚至更高学位的人(69%)更有可能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 美国对华政策专家之间产生“代沟”

《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期载文称，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正呼吁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经验丰富的“中国通”一直推崇对华接触。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最近主办的一个论坛凸显了这种对华战略“代沟”。

论坛联合主席、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在一个小组会议上指出，“很少有人希望中美之间存在永久性对抗，更别说产生冲突了”，“中美关系需要

一个竞争共存的框架”。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 (Jeffrey Bader) 说：“现在我担心的是，由于中国被认为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整个对华接触的框架会被抛弃。”

论坛联合主席谢淑丽 (Susan Shirk) 警告称，在打击知识产权盗窃的斗争中不要过度，这可能会把有才华的中国科学家赶出美国，引发“反华版的红色恐怖”。

然而，几位“新生代”专家对中国的意图保持更高的警惕，敦促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梅勒妮·哈特 (Melanie Hart) 称，“北京的做法往往是零和博弈，它的目标是超越美国”，中国正寻求利用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利用其迅速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使全球体系更加专制”。

曾在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负责中国政策的埃文·梅德罗斯 (Evan Medeiros) 称，美国应该谴责北京的胁迫和掠夺性行为。但他在本次辩论中呼吁宽容，“双方都能更好地达成妥协”。

然而，“代沟”并不是绝对的，与会者在有些政策上具有共识。例如，为了应对中国带来的经济和安全挑战，美国需要大幅增加对教育和先进技术研究的投资，同时利用国际联盟的优势，让北京的行为发生“积极的”改变。

### 美学者称需警惕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上升

《华盛顿时报》8月26日登载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雷特·谢弗 (Brett D. Schaefer) 的文章称，屈冬玉近期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领导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中国人进而增加到4人，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持续上升，美国应该引起重视。

最近一系列强调中国在联合国系统影响力的新闻、文章，通常将此归因于美国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让出国际领导地位”。然而，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中影响力的上升并非新现象，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前就已经开始。

谢弗称，该趋势令人担忧，“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并非良性力量，正在寻求改变联合国的价值观、计划和政策，使之有利于中国的优先事项和意识形态”。随着影响力上升，中国有能力维护与美国利益相左的政策，或者削弱被中国视为麻烦或有问题的联合国机制。

谢弗写道，美国不能完全扭转中国影响力上升的趋势，但必须采取战略措施，确保中国的影响力受到合理遏制，确保中国的领导地位受到限制。这需要一个广泛、全面、长期的战略，其基础是对中国的利益和策略进行详细评估，促进美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在主要国际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促进更多美国人在国际组织中的就职，并有目的地、明智地施压。

## 在全球化时代，中美经济一损俱损

无论美中经济关系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它都极大地造福了两国社会，其破裂将打击两国经济，对双方国内繁荣造成巨大损害。

美国《政客》杂志近日载文称，特朗普经常宣称美国加征关税伤害了中国经济，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中国经济受损，美国必将受到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当中国最近宣布其季度经济增速从 6.4% 放缓至 6.2% 时，特朗普在推特上称，中国经济放缓是由其加征关税直接导致，这将迫使中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政府称希望达成贸易协议，

但特朗普似乎格外乐于看到自己的政策正给北京带来经济损失。

上述政策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经济下滑甚至崩溃不会对美国 and 全球其他国家造成伤害。这显然十分荒谬，中国经济疲软不会造成美国国内经济疲软的想法是上世纪 50 年代的幻想。特朗普喜欢把中美争端看作零和博弈——当中国衰落时，美国就会崛起。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有可能的结果是两者一起被拖下水。

在过去 20 年里，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不断发展，双边贸易额超过 7000 亿美元。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深深融入了全球供应链网络，其中涵盖很多美国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在美国国内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国内经济与中国的联系程度显而易见。由于中国政府加征报复性关税，美国对华出口（主要是农产品）大幅下降，这迫使美国政府拨款 280 亿美元来扶持那些出口业务蒸发的农民，这比财政部征得的关税还要多（当然，关税也由美国公司支付）；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大幅下降，从 2016 年 400 多亿美元的高点跌至今年的不足 100 亿美元；此外，中国对美国房地产的购买量已经减少，中国学生和游客在美国的消费也在减少。

但相较而言，如果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下滑，上述后果都是次要的。中国国内经济疲软不仅将继续打击美国出口商和那些依赖中国投资的企业，还将影响整个亚洲。日本和韩国尤其容易受到冲击，因为其经济依赖于向中国出售高端产品。德国也是如此，而德国的衰落又会加大整个欧盟的压力。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引发一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衰退。

关税伤害了中国，但也伤害了美国自身。已经有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复苏正在放缓。虽然不管特朗普政府做什么，这可能都会发生，但关税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美国国内对经济陷入严重

衰退的担忧依然存在，不安和不确定性正在侵蚀过去三年一直高涨的商业信心。白宫可能已经说服自己，它可以对中国为所欲为，且不会产生任何反作用，但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情况并非如此。

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让那些声称与中国进行经济对抗广受欢迎的人被“打脸”：64%的受访者支持自由贸易，这一比例自特朗普上任以来大幅上升。尽管特朗普及其盟友声称，由于多年来的糟糕协议，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但许多人意识到，无论美中经济关系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它都极大地造福了两国社会，其破裂将打击两国经济，对双方国内繁荣造成巨大损害。

特朗普政府一直宣称，它可以胁迫中国，在对美国国内造成的损失最小化的情况下切断中美关系。由于贸易战目前只持续了一年多，实际加征的关税只有数百亿美元，所以上述谎言还没有被揭穿。但这个谎言越来越难以维持，数据也越来越有说服力。让美中经济“脱钩”的系统性变革或许是可能的，但需要的时间、造成的痛苦和破坏比白宫想象的多得多。

## 美国外交

### 美专家：留给美朝达成协议的时间不多了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8 月 19 日载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多次试图就朝核问题找到外交解决方案，但双方实现真正突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文章摘要如下：

在朝鲜问题上，任何解决方案都需要囊括美、朝、韩三方，其中任何一方都有可能破坏谈判。尽管谈判可能因对方的行动而失败，但更有可能因各自的国内政治而失败。三国领导人都明白，支持者对一再举行的峰会失去了耐心，希望看到立即取得进展。

此外，三国国内的反对派也总是准备好批评政府的外交努力。

朝鲜将 2019 年底设定为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鉴于任何协议都需要至少数月的时间来谈判，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仍有可能达成一项不只是关注无核化的协议。协议可以聚焦和平条约或联络处，或者是以有限的无核化换取有限的放松制裁。至少，达成一项小规模协议将有助于避免局势再度升级。

即便如此，仍要与时间赛跑。韩国将于 2020 年 4 月进行选举，如果文在寅所在的政党在选举中失利，他可能会被迫放弃与金正恩接触的策略。如果文在寅表现出色，那么在距离 2020 年 11 月美国大选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积极谈判可能会继续。如果三国因为缺乏时间和远见而错失这一机会，那将是真正的悲剧。

### **美学者：特朗普关心的不是以色列而是连任**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 8 月 20 日刊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沙洛姆·利普纳 (Shalom Lipner) 的文章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取悦特朗普而禁止美国两位民主党众议员入境的决定不仅损害了国家形象，还严重危及美国国会两党对以色列的支持，事实上，特朗普关心的是连任而不是以色列。

特朗普将矛头对准国会少数族裔民主党众议员拉什达·特莱布 (Rashida Tlaib) 和伊尔汗·奥马尔 (Ilhan Omar) 等，以刺激保守派共和党选民。事实上，他对几位议员的敌意已成为其 2020 年连任战略的重要部分。特朗普的目的或许达成了，但该决定给以色列带来的只有损失。

此举必然将引起国会民主党人的反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分歧可能进一步加剧。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为以色列带来了至关重

要的外交、安全和经济红利。若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转变，将对以色列的地位及其在全世界的成功带来不利影响。

在把全部赌注押在特朗普身上之后，内塔尼亚胡发现自己现在“骑虎难下”。随着 2020 年竞选活动升温，特朗普几乎肯定会要求内塔尼亚胡继续为他们的友谊“买单”，这将使以色列在美国成为一个分裂的政治议题，并可能危及美国对以色列脆弱的两党支持。

### **美学者：中国影响力上升，美国应寻找目标替代吉布提**

《国际利益》期刊网站 8 月 25 日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迈克尔·鲁宾 (Michael Rubin) 的文章称，吉布提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中国在该国的影响力上升，美国应寻找其他地方来替代吉布提。

几十年来，吉布提在美国国家安全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与该国的地位成反比。吉布提一直是美军的后勤中心，而该国地位真正突显是在“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推动成立非洲之角合成联合特遣部队 (CJTF-HOA)，以协调和组织区域维稳行动，监督在也门和边境地区的反恐行动。奥巴马政府对无人机打击的依赖渐增，进一步提升了吉布提的重要性，因为许多打击是在吉布提发起。位于吉布提的莱蒙尼尔军营 (Camp Lemonnier) 目前是美国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非洲司令部作战的基石。

当然，并非只有美国认识到吉布提的战略地位。法国也在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德国和西班牙军队在此驻扎，意大利和日本也有设施，沙特和阿联酋在此租用场地。随着在印度洋和非洲的利益扩大，中国在吉布提建了一个重要的新基地。

然而，并不是每个投资者都是等量的。中国出资为吉布提修

建了一条输水管道，以及一条通往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铁路。虽然美国对吉布提的援助在 2017 年达到 3100 万美元的峰值，但同年一家中国公司与吉布提签署了一份 40 亿美元的天然气初步协议。

随着中国在吉布提的影响力可能会随时超过美国，特朗普政府有必要找到吉布提的替代者。索马里兰共和国可能是一个选项。其主要港口柏培拉拥有非洲最长的飞机跑道之一。最重要的是，索马里兰当局希望美国在那里。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接近索马里兰，该国民选的亲西方政府一直支持美国。到目前为止，问题在于美国国务院。尽管 1991 年索马里兰宣布独立后，美国表示承认该国，但国务院现在奉行“一个索马里”政策，实际切断了与索马里兰的直接往来。

如果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美国无法在打击恐怖主义、伊朗代理团体以及极端组织的斗争中保护自身利益。美国不必离开吉布提，但现在是时候考虑备选计划了，否则北京对吉布提总统的一声“耳语”就可能削弱美国保卫自己及盟友的能力。

### “灰色地带”行动预警面临的挑战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国际安全项目副研究员林赛·谢帕德（Lindsey R. Sheppard）的文章称，美国要识别并预警敌人的“灰色地带”行动，需要整个国家安全界采取行动，更好地收集、分析和应用情报。

文章首先分析了预警归因和网络归因的难处。文章称，“灰色地带”预警所需的信息类型不同于传统预警概念，“灰色地带”行动通过政治、经济、能源、网络、空间和信息领域的竞争带来了新的“战斗秩序”，使得数据收集和分析变得异常困难，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暂时性、归因和意图这三大关联因素：“灰色地

带”威胁本质上是暂时的，识别其本质需要具备跨时间、跨区域和跨领域的“大局意识”；由于大量数据归私人企业所有，针对政策行动的归因成本上升，对意图的判断难度也随之增加；暂时性和归因带来的挑战会直接影响对敌人开展“灰色地带”行动的意图的判断。

文章称，美国的“灰色地带”行动预警还存在三个方面的挑战和限制。第一，政策挑战与限制。“灰色地带”行动寻求逐步改变竞争环境，易使美国逐渐适应新常态，从而对长时间、跨部门的预警构成挑战。美国也因此经常陷入短期利益与长期战略目标(或威胁)博弈的矛盾状态(美国政治结构更倾向于短期利益)，同时跨越了公与私、外交与国内政策的界限，从而导致事项优先级和资源分配不明确，丧失主动出击的机会。

第二，情报挑战和限制。无论“灰色地带”行动的类型如何，要处理“灰色地带”预警三大元素需要数据可视化，多种信息源融合，在不确定环境下作出合理判断的机制。因此情报过程必须具备高度灵活性和动态性，跨越单一威胁载体，跨功能领域、跨技术和跨区域地进行研究，以及时发现并通知和转移资源。但美国目前的情报处理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第三，全球化挑战。技术全球化导致美国保持研发和部署领先地位的难度增加，同时在全球经济和安全环境下，盟友间合作、公私部门间的合作也将面临诸多风险。尽管美国力争保持持续的技术优势，但其他国家正在建立更强大、更多元的科技。

由此，文章对“灰色地带”行动的预警框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将不同的信息源整合进一个内聚、可操作的产品之中。利用信息集成、数据可视化和地理空间分析工具，迅速整合和共享信息，实现跨部门与跨国合作，有效识别、监测和评估作战区域威胁，并保持所有参与行为体行动一致。

第二，建立反馈机制，灵活结束行动-反应循环。“灰色地带”威胁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需要及时评估和调整，以确保美国跨部门参与者掌握主动权。整个行动-反应循环的反馈也须贯穿于整个持续且有针对性的行动之中，避免因信息中断而造成信息空白，防止虚假信息入侵。

第三，加强盟友间、公私部门间的积极合作。经验表明，在应对“灰色地带”威胁时，盟国和伙伴的集体反应和协调行动最为有效。与智库等私有实体的协作能进一步提高公众对“灰色地带”威胁的意识。强调公私部门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的领导作用，也能使美国保持“灰色地带”预警所需的持续性技术优势。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学者分析政府如何导致美国财富不平等

《国家评论》网站 8 月 19 日登载卡托研究所经济学家克里斯·爱德华兹 (Chris Edwards) 的文章称，政客们一直抱怨财富不平等，但正是他们制定的政策引起了不平等。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财富不平等最近几年来有所加剧，但并不像民主党和很多媒体文章所暗示的那样高。财富不平等近年来小幅上升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的经济创新，这种创造财富的方式正在拉动社会进步，而非零和博弈。但是美国政府自身至少在两个方面加剧了财富不平等。

首先，政府向富有的局内人 (wealthy insiders) 提供补贴、监管优惠和其他权贵资本主义好处。其次，几十年来，政府不断扩大社会项目，削弱了对中低收入家庭储蓄的激励，同时高税收也降低了他们的储蓄能力。除了最富有的家庭，政府的计划已经

取代或排挤了所有美国家庭的财富积累。

相较于富人，社会保障在非富人退休收入中的占比更高，这一排挤效应加剧了财富不平等。更多的政府福利导致私人财富减少，对非富人而言尤其如此。取代私人储蓄的不仅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还有失业保险、福利和其他社会支出。为了解决财富不平等的问题，政府应向以储蓄为基础的社会项目过渡。

### **美学者：改革针对合法移民的政策才能解决美边境问题**

美国卡托研究所 8 月 20 日登载该智库移民政策分析师大卫·比尔（David Bier）的文章称，只有改革针对合法移民的政策才能解决美国的边境问题。

文章称，许多中美洲人都是依靠边境庇护和其他处理程序非法越境的，美国的庇护制度和边境处理系统早已不堪重负。鉴于阻止难民流动或限制庇护的努力未能成功，目前控制边界最现实和人道的方法在于建立一个更有序的移民法律结构。

美国国会和政府需要进行以下五项改革：第一，人道主义假释。免除正在申请绿卡和有家属合法居住在美国的中美洲人的入境限制。第二，私人资助难民。按照美国国务院 2016 年的计划，允许美国居民和各类组织资助海外难民。第三，放宽外来雇工签证。将中美洲 H-2A 签证和 H-2B 签证的周期性工人计划的时间范围拓展至全年，同时免除 H-2B 签证的上限。第四，合法化。将没有严重犯罪前科的非法移民合法化，允许他们与配偶和子女团聚，进一步消除未来的非法移民网络。第五，港口审核。取消对入境港口寻求庇护者的限制，百分百处理他们在港口提出的要求，同时根据他们的出庭情况，释放并向其发放就业授权文件。

上述改革不能阻止所有的寻求庇护者，但却能将难民重新引

导至其他法律轨道之中，从而使美国当局重新管理庇护程序。

## 民主面临风险，不信任感正在侵蚀美国的生活方式

《国家利益》期刊网站 8 月 20 日载文称，近年来美国人民对媒体、政府和民主规范的信任度大幅下降，美国需进一步加强政府机构建设，促进社会的健康良好运转。

文章分析了失信危机的生成原因：首先，近年来精英对经济、政治和社会机构的控制不断增强。富人和精英阶层相对平民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等公共设施方面享有更大特权，进而引发人们的不满，甚至催生了民粹主义运动。其次，里根总统时期的箴言，即“公共机构尤其是政府才是问题所在”，如今成为许多人贬低政府官员工作的忠实信条。此外，全球主义也加剧了人们对民主的不信任。

鉴于此，美国需要通过以下途径重建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第一，进一步加强公民教育，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公民之含义，促使其更好享有公共机构提供的服务；第二，公共机构应正确处理信息，保持全面透明，并以更好的基础设施、更专业的精神和更充裕的资金不断提高服务能力；第三，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同时利用良好的治理机制，充分协调中央与地方机构的资源分配，以增强公共机构的响应能力、公平性、透明性和包容性。

## 特朗普的经济焦虑

《大西洋月刊》网站 8 月 20 日载文称，虽然特朗普坚称美国经济强劲，但他明显表现出对经济衰退的焦虑。文章摘要如下：

特朗普就经济发出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信号，他一方面坚持

认为美国经济很强劲，一方面又施压美联储降息，指责媒体试图“制造”衰退，提出削减工资税，并推迟针对中国的关税。目前还不清楚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清楚这将对特朗普的政治前景产生何种影响。但特朗普的行为表明，他对这两个问题都深感担忧。

特朗普竞选时承诺，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经济将以每年 4% 的速度增长，并将创造 2500 万个新就业机会。如今两年半过去了，美国季度经济增长并未突破 4%，新增就业岗位约 600 万个，远低于他当初的承诺，甚至低于奥巴马执政期间的就业增长。

虽然，总统对经济的控制很小，但他的确拥有一些杠杆来撬动经济。然而，特朗普对这些杠杆的使用值得怀疑。特朗普 2017 年通过了大幅减税计划，虽然此举可能会刺激经济，但在政治上并不成功，也未能阻止当前的经济动荡。特朗普还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扰乱经济增长。虽然特朗普的惩罚性措施对其他国家造成了一定伤害，但他无法阻止全球经济压力向美国“回流”。

特朗普可以改变关税政策，但放弃激进的贸易立场也会给特朗普带来其他问题。这样做不仅会背弃他在 2016 年做出的核心承诺，还会背弃数十年来以保护主义手段应对中国和贸易的信念。特朗普无力继续贸易战，但他似乎也无力结束贸易战。

## 关于美国枪击死亡的十个问题

皮尤网站近期载文，就 10 个关于美枪击死亡的问题进行解答，答案基于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以及联邦调查局(FBI)等机构的数据。文章摘要如下：

第一，美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伤害？据 CDC 的数据，2017 年美国有 39773 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伤害。这个数字包

括枪击谋杀、枪击自杀和 CDC 追踪的其他三种不太常见的枪支造成的死亡：非故意、与执法有关或情况不明。（CDC 的死亡统计数据是基于死亡证明中包含的信息。）

第二，在美国所有谋杀和自杀事件中，有多少与枪支有关？2017 年，美国四分之三的谋杀案涉及枪支，大约一半（51%）自杀涉及枪支。

第三，美国枪击死亡中谋杀和自杀的比例分别是多少？尽管自杀受到的关注往往比谋杀少，但长期以来，美国枪击死亡大部分是由自杀导致。CDC 的数据显示，2017 年，美国枪击死亡中六成是由于自杀（23854），37%是谋杀（14542）。其余为非故意（486）、执法相关（553）或情况不明（338）。

第四，从长期来看，美国枪击死亡人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2017 年共有 39773 人死于枪击，至少是自 1968 年以来最多的。近年来，枪击自杀和枪击谋杀数量都有所上升：2006 年至 2017 年，枪击自杀数量总体增长 41%；2014 年至 2017 年，枪击谋杀数量增长 32%。2017 年，枪击自杀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枪击谋杀数量仍远低于 1993 年的最高水平。

第五，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枪击死亡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虽然 2017 年美国枪击死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个统计数字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口的增长。按人均计算，2017 年每 10 万人中有 12 人死于枪击，这是 20 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 1974 年的比例——每 10 万人中 16.3 人死于枪击，这是 CDC 在线数据库中最高水平。其中，2017 年每 10 万人中有 4.6 人死于枪击谋杀；2017 年，每 10 万人中有 6.9 人死于枪击自杀。

第六，美国哪些州的枪击死亡率最高或最低？2017 年，枪击死亡率最高的州是阿拉斯加州（平均每 10 万人中有 24.5 人死于枪击）、阿拉巴马州（22.9 人）、蒙大拿州（22.5 人）、路易斯

安那州（21.7 人）、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均为 21.5 人）、阿肯色州（20.3 人）。枪击死亡率最低的州是新泽西州（每 10 万人中有 5.3 人）、康涅狄格州（5.1 人）、罗德岛州（3.9 人）、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均为 3.7 人）、夏威夷州（2.5 人）。

第七，美国的枪击死亡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对 195 个国家和地区枪击死亡率的研究，2016 年，美国平均每 10 万人中有 10.6 人死于枪击。这远远高于加拿大（每 10 万人中 2.1 人）、澳大利亚（1.0 人）、法国（2.7 人）、德国（0.9 人）和西班牙（0.6 人）等欧洲国家。总的来说，美国的枪击死亡率在全球排第 20 位。

第八，美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对“大规模枪击”一词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定义。FBI 收集了有关“活跃枪手事件”的数据，并将“活跃枪手”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在人口密集地区杀人或试图杀人的个体”。2018 年有 85 人（不包括枪手）在此类事件中丧生。

第九，从长期来看，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数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FBI 发现，2000 年至 2013 年间，“活跃枪手事件”有所增加。年均事件数量从头七年的每年 6.4 起上升到第二个七年的每年 16.4 起。在随后的研究中，2014 年和 2015 年各发生 20 起“活跃枪手事件”，2016 年 20 起，2017 年 30 起，2018 年 27 起。

第十，在美国，什么类型的枪支最常用于枪击谋杀？根据 FBI 的数据，2017 年，美国 10982 起枪击谋杀案和非过失杀人案的绝大多数（64%）涉及手枪，4% 涉及步枪，2% 涉及猎枪，剩余 30% 涉及“其他枪支或未注明类型枪支”。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